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社会学组理论座谈会纪要

受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发起单位和筹委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8年9月9日主持召开了社会学现代化理论座谈会。这是为介绍和先期讨论本次研讨会将要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而召开的六个小型理论座谈会当中的一个。会议重点研讨的内容是：（一）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理论范畴及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二）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描述和比较分析；（三）中国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出席社会学分组会议的代表共30人，三位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主编张琢，讲题是《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王颖，讲题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孙立平，讲题为《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现状和制约条件》。会议采用讲座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会场气氛热烈。

孙立平首先发言，他提出了分析迟发展国家现代化条件的一个新视角。他说，从我国国内来讲，迟发展研究比较晚，而国外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迟发展问题的前提条件，是世界上搞现代化的国家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展早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一部分是发展晚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晚发展或迟发展国家。晚发展国家与通常所讲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大体重叠，有所不同，即晚发展国家的概念外延比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更宽泛一些，晚发展国家除包括发展中国家之外，还包括发达国家中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等。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从这样的两分法当中，探寻迟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它们所面临的特殊条件和需要采取的特殊对策。过去分析我国现代化特殊道路时，从内部着眼的分析较多，如资源、工业基础、人口素质、体制结构等等，而迟发展分析则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例如，过去分析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往往从东方文化、儒家思想影响或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的日本封建残余等方面分析，但从迟发展理论角度分析，则可以做出这样新的解释，即由于日本的工业化起步晚于英美法等国，当日本与外部建立联系时，可以接受现成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此，企业老板就必须投资培训工人以弥补工人素质与技术之间的差距。资本家在付出投资后不希望工人离开企业，因而只能提高工人住宅、补贴或其他福利，使工人继续在他的企业中工作。这就是从迟发展理论做出的新解释。接着，孙立平从5个方面分析了一些重要的迟发展效果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即迟发展国家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及其对现代化进程造成的抑制与震荡；迟发展国家社会各个部门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示范效应使迟发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承受巨大压力；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人为性质，决定了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极端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全文已发本刊1988年第2期）。

围绕着上述几个问题，许多同志纷纷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有同志不同意早发展国家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和单一的观点，认为早发展国家内部社会分工多，利益集团多元化，相互冲突

必然就多，这些国家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而在迟发展国家中，新生的利益集团代表着外来的思想，因而受到内部传统文化的排斥，例如中国的洋务运动、买办阶级和现在的改革派。因此，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际冲突。另外，先发展国家的发展不是从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发展开始的，而是从人的发展开始，而在这些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如英格兰与苏格兰、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与农业地区、英国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相当明显。有同志提出，在借鉴迟发展理论时必须特别注意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必须找出我国目前所处内外环境与迟发展理论形成时的内外环境的差异。迟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后发展国家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在后帝国主义时期非常明显，仅仅靠后发展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能造就出企业家阶层或中产阶级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承担者阶层和受益者。我国能否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呢？从国内看我国没有发生过一场工业革命；从国际环境的制约看，也很难产生一个独立的、能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够成为本民族文化载体的阶级。跨国公司的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上层人物整合到国际资产阶级之中，而同时造成了国内阶级的分化，很难形成作为国家支柱的中产阶级。同样，我国也不能用知识分子阶层来代替中产阶级。因为我国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他们代表着本国的文化但却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他们已经分化到了各个利益集团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做一个透彻分析，同时借鉴包括马克思发展理论在内的各种发展理论，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现代化理论。

王颢同志在发言时首先就如何评价9年来的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或从经济发展与非经济的发展来看，社会与非经济因素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我们更需要考虑如何优化改革的环境，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继而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失控，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障碍。二是对社会发展认识不足，把发展经济当做最终目标，没有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分析影响改革的各种因素，缺乏预见性。目前，我国小农业种植已经发展到顶点，并且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小城镇发展步履艰难。如果大城市和小城镇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的话，有可能促进双方发展，但双方的条件不是对等的，小城镇抗不过大中城市的竞争。农村改革难以触动大城市，而小城镇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为了发展农村乡镇，企业采取了如下办法。①铺摊子增产值。乡镇企业并没有集中在乡镇。据统计，浙江省增加100万元产值需占耕地2.5亩。1979—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累计占用8000万亩耕地，转移劳动力5500万人，人均占地1.45亩。按这个比例，全国如转出3亿农民需要4.35亿亩耕地。②节约开支，扩散污染。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县城连排水网络都不具备。江苏省水资源丰富，水域占17%，但目前除长江一部分和太湖水质良好外，全省其他水域都被污染，江苏乡镇工业每年排放废水7.7万吨，废气1168.9亿立方米，废渣水592.67万吨，由于大部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致使全省40多万亩农田受害，反过来又毒害城市，贻害子孙。农村改革有两个盲目性：一是人口流动的盲目性，脱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为地设计转移目标，而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二是脱离实际扩大城镇规模，县镇根本不具备承载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的能力。工业化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在选择城市化的途径时，必须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避免用农民运动的方式方法来指导我国今天的社会改革。此外，王颢还论述了目前人民对改革的心理承

受能力问题和教育问题。我国目前文盲 2 亿多，若用新的 1500 个常用字的客观指标统计，文盲人数比例更高。而且目前流失生现象严重，仅湖北一省 1987 年 6—14 岁学龄儿童失学人数就达 150 万，福建宁德地区的 853 名教师离校自谋出路，致使 148 所学校关闭，2800 名学生求学无门。北京地区 1979~1984 年 5 年中，中小學生有 25.9 万流失，其中小学生 6 万人。天津市 265 所中学 1979、1980 年两年流失中学生 9704 人，占学生总数的 9.5%。最后，王頔还谈到了我国当前的犯罪问题。

张璩同志结合访日观感从 6 个方面比较了中日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在地理上，日本是一个岛国，四周临海，国内鲜有离海洋的直线距离超过 100 公里的地方，海岸线长达 3 万多公里，具有众多良好的港湾，全境都在北温带，地理环境与世界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发祥地英伦三岛相似。资本主义是在温带伴随航海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有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天然条件。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 25 倍，但占全国面积 90% 的大陆的海岸线仅为 18000 公里，而且有些不便建港的沙岸。全国 80% 以上的土地在离海岸 100 公里以外的地区，虽然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从传统上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大陆国家。一般来讲，尤其在航空和陆上运输发达以前，离海愈远，愈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从外部引发的后发达国家的工商业的发展。第二，文化上，中国的本土文化历史悠久，没有间断，以世界上最众多的人口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形成了巨大的“历史和数目的力量”，主体性强，故中国虽然不能被灭亡，也很难改革。而日本的国家小，人口密度大，但总人口至今（1.2 亿）仍为中国的 1/9，有对自己文化的“中空感”，并历史地形成了善模仿、吸收的良好传统，因而接受外来的影响、变革也较易。第三，在民族构成上，日本人由于在古代长期生活在海岛上，民族构成比较简单，除极少数阿伊奴人和朝鲜、中国的侨民外，绝大多数为大和民族。狭小的土地，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日本整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步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文化上的同质性便于全民族统一意志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中国则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虽然经过了长期的民族交融，但各民族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仍很不平衡。第四，在政治上，日本自镰仓以后至明治维新以前，是作为民族和国家象征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和拥有实权的幕府构成的双重结构。明治维新前由将军、大名控制的幕府是政权的“硬核”，明治维新时期，下级武士得以利用儒学的“忠”和“诚”的思想武器及农民、城市贫民反抗幕府的力量实现倒幕，达到“王政复古”，建立天皇制专制政府，启用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政治技术精英人物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向来是绝对君权主义的单一政治结构，难以通过其内部的结构变革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只有通过外部或内部的力量推翻旧的皇权才能更新政权，是“取而代之主义”。第五，从经济结构看，日本封建时代的地主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庄园制，财产为长子继承制，一般来说，象西欧和日本式的庄园经济的规模要比中国一夫一妻的家庭小农经济的规模大，经营内容和分工也要多样化一些，有利于手工作坊的依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封建后期主要是租佃制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农业自然经济，经营方式是基于两性差别的自然分工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制，并使中国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状态。第六，在教育方面，日本的文字灵活且实用，便于为一般的老百姓掌握，识字率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比例就已经很高了。而且，日本封建时代的社会统治基础是封建武士，他们重在力行，见效快，而中国自汉以来独尊儒术，举孝廉，宋明理学更是把儒生的功夫引导到修身养性的内省上，缺乏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而往往流

于闭目塞听，坐而论道，文字反而成了特权者愚民政策的工具，直到解放前，居民识字率仍然很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长陆学艺在发言时指出，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从体制上讲是二元结构问题，即工人与农民，城市人与乡村人、两亿人与八亿人的关系问题。许多腐败现象都与此有关。回顾10年来农村的发展进程，总的来说前6年（至1984年）比较顺当，其中1978年到1984年是建国以来农村发展最快的6年，堪称农业的黄金时代。1984年我国粮食增长2000亿斤，实现这个增长只用了6年时间，而实现第一次粮食增长2000亿斤则花了21年，第二次花了8年时间。1978年农民人均年收入133元，1984年达到357元，去掉物价上涨因素也是上了一番，农村产值包括乡镇企业产值在内翻了一番，农业产值增加50%。但是1984年的粮棉丰产又使我们犯了1958年的错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1984年国家财政统不起，取消了统购统销，同时消费经济学出笼，鼓吹吃肉蛋奶，最后牺牲农民利益，至今粮食价格仍低于1980年价格。1985年后农业开始持续萧条，今年粮食预计仍要减产。今年粮食减产主要不是气候原因，因为我国几条主要大河都没有灾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政策。农业不稳，整个经济就难以稳定，物价必然上涨。农村第二步改革步履难艰，问题在于整个体制是吃农业、吃农民的体制，两亿人靠八亿人养活。1985年放开副食品价格的负担工业至今没有消化。建国后工业体制是铁交易、铁饭碗、铁工资的体制，厂子越大工人越不干活，全国职工1/4处于在职失业状态。为了维持这些企业，我国施行了低工资和低原料价格政策。这种二元结构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的，吃公家饭的人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城市是嫡系，农民必须纳贡。现在农民觉悟过来了，70%以上农村当家的是40岁以下的人，他们具有平等交换思想，而我们的领导办法没有变，“按价值规律领导农民、按价值法则与农民打交道”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农村干群矛盾的白热化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与宗法社会因素的残余。二元结构问题不解决，其他矛盾也不能解决。

最后，总后学院战略研究室的王东介绍了国防社会学的现状及学科建设的基本设想。

（李国庆）

书 讯

△水延凯等编著《社会调查教程》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32万字。

△韩明汉著《中国社会学史》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15.5万字。

（张）